

抗战中的白草口长城

□杨继东



作为山西省屈指可数的包砖长城,白草口长城位于朔州山阴县和忻州代县交界处,曾是明代雁门关外的关口防线,2020年被列为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抗战初期,著名的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等战役就发生在其沿线地区。

白草口长城之魂

九一八事变后,驱逐日寇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地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白草口长城沿线有个村庄名叫“太和岭口村”,七七事变后在该村设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总部,即第二战区最高军事长官阎锡山的前线指挥部。同年9月,周恩来、彭德怀、左权一行人到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事宜,达成了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的协议。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八路军总部组建晋东北游击司令部,成立5个游击大队,其中第四大队在代县一带活动,该队于12月底将代县民间抗日武装收编。10月,县动委会还在代县峨口成立了军事部,次年1月军事部改为自卫队总队部,完全由地方党组织领导。

19日夜,八路军渡过滹沱河向白草口长城南的代县阳明堡飞机场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击毁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冬,抗日民主政府在峨口邀请本县30余名士绅参加座谈会,主题就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民参战。会后,爱国人士康庚一次性捐稻谷100石、内蒙产羊皮大衣100件,杨生文捐食用油400斤、高粱和黍谷子50石、大洋150块。富户子弟杨士珍、杨子玉二人也积极响应号召,在代县沦陷后,利用自身大学毕业生条件组织爱国青年学生成立“青年挺进军”,与日军开展游击战。这一年还组建了“抗日武装代县营”“代县特务连”“代县基干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后都接受整编成为正规队伍。

抗战时期,代县涌现出许多烈士。刘熹亭,今代县新高乡刘家圪洞村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专攻文化史,代表作有《忽必烈征倭之研究》。1933年与友人成立西北论衡社,出版杂志《西北论衡》,并任总编辑。1940年7月,刘熹亭遭遇敌机轰炸,不幸以身殉国,同行人为其建亭刻碑作为纪念,时年仅28岁。郎焕生,代县峨口镇富村人,曾是一名巡路警察。七七事变后主动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县农委武装委员。同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郎焕生服从组织安排,留下稳定群众斗争情绪,保存抗日“火种”。1941年5月,他在康家湾村被日伪军包围,突围过程中负伤,当日军准备活捉他时,郎焕生突然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

白草口长城新课题

研究抗战时期白草口长城的文化,要把红色基因谱系中的抗战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长城精神有机融合,实现白草口长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境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包括平型关大



古诗中的数字意趣

□陈林

巧妙运用数字入诗常能化平淡为神奇,变乏味为有趣,使枯燥的数字发挥出神奇的修辞功效,焕发出盎然诗意。

数字点染,精妙难言。古诗中常用数字实写事物,前呼后应形成点染。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中写“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先以“三两枝”具体描写桃花零星开放的实景,渲染初春的环境气氛,再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点明题旨。“三两枝”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点出初春的景物特征——少则春寒料峭,过于冷寂,多则春意盎然,稍嫌热闹,都无法与后文“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季候变化的感悟相呼应。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云“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先点出“春色满园”的主旨,再以“一枝红杏”具体渲染春天压



抑不住的蓬勃生机,以及作者游园不成忽见“春色”破墙溢出的惊喜。这个“一”是其余数字替代不了的,数字点染,准确精当,妙不可言。

数字比喻,言近旨远。古诗常用数字与相关事物合成妙喻以状物抒情。李白《赠汪伦》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夸张的“千尺”潭水与“汪伦送我情”合成程度不等的妙喻,化无形友情为有形潭水,生动展现汪伦踏歌送行的深情厚谊。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比喻状写雪压枝头的壮观景象,流露出作者内心压抑不住的惊喜。

数字对比,强化情感。用数字对比入诗以体现事物矛盾,强化诗人内心情感。李白《早发白帝城》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里”写空间之遥,“一日”言时间之短,“两岸”猿声未停,轻舟越过“万重山”。夸大的空间和写实的时间对比,突出舟行轻捷,抒发了诗人遇赦东归的喜悦之情。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封”诉因由之微,“八千”写路途之遥。“一封”与“八千”对举,于巨大的数字反差中表达作者忠而获罪、非罪远谪的强烈愤慨。

数字排比入诗可增强语言节奏和气势。《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以连续的数字排比快节奏速写成长过程,刻画出一个自小能干明礼、多才多艺的刘兰芝。《陌上桑》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用“十五”“二十”“三十”“四十”一系列数字排比,铺叙夫婿的擢升经历,展现其风华正茂,才干超群。

古诗常用数字与多个名词性词语组成生动可感的图景,以构成列锦状物抒情。邵雍的《山村咏怀》中写“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用数字列锦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独立风景巧妙组合成一幅清新淡雅的田园图,表达了诗



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数字运用意达声谐,浑然天成。《清稗类钞》亦载:“高宗南巡过江时,见有一渔船荡桨而来,命纪文达咏诗,限十个一字。文达立成七绝,诗云:‘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梢头一钓钩。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纪晓岚以简单的数字列锦精彩素描出渔人秋日独钓的安闲情景,不得不令人称绝。

古诗常用数字前后搭配构成句式匀整、音调和谐的对偶。杜甫的《绝句》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和“一行”并列,“万里”与“千秋”对举,构成两组相映成趣的数字对偶。柳上黄鹂一只过于孤单,几只稍嫌吵闹,只有“两个”才能体现双栖双宿相向和鸣的闲适,而“一行”则写出了青天上下白鹭高翔、联成一线的优美意境。“千秋”言时间之久,“万里”写空间之遥,“千秋”“万里”拓展了想象的时空,于尺幅之中绘出无限风光,增

强了诗歌意境的厚度和立体感,表现出诗人身在草堂,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开阔境界,让人于短短诗句中感受到自然的壮阔美丽和生命的渺小卑微。两组对偶自然天成,朗朗上口。

数字铺垫,以助逆转,全新意境令人耳目一新。郑板桥《咏雪》曰“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前三句堆砌数字,从一至十至千至万至无数,尾句作者出其不意将笔锋一转,写雪花飞入梅林融入梅花,消失不见。逆转后的诗意和前文构成一幅完整画面,形成一种苍茫深邃的意境。第四句逆转是点睛之笔,不仅使前三句的数字堆砌变成一种有意为之的铺垫,而且更见雪花狂舞的气势和寒梅傲雪的精神,读之使人宛如置身大雪纷飞的广袤天地。

数字顶针,首尾蝉联。萧衍的《芳树》云“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一叶度春风,芳芳自相接”,描写树木变绿散发出满树的芳香。“一叶”上递下接,使前后两句首尾蝉联,形成数字顶针,揭示了诗人赏玩芳树时领悟到的人生哲理:一叶之芳不如众叶之芳,个体力量不如群体力量。

辞格兼用,数字入诗有时不只用一种修辞。《诗经》中载:“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三个“一日”反复强调,和“三月”“三秋”“三岁”的数字夸张,对比产生强烈语言张力,不断放大抒情主体的心理特征——因不能与心上人见面而度日如年的愁闷。数字意象的反复叠加形成语句的排比和语意的递进,在增强诗句语气的同时强化了读者心理感受,使诗歌的抒情意味更加浓厚。唐代李峤的《风》云:“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三秋”“二月”实写时令,“千尺”“万竿”夸张状物,突出风力之大——能使晚秋的树叶脱落,能催开早春二月的鲜花,经过江河能掀起千尺巨浪,刮进竹林能把万棵翠竹吹得歪斜斜斜。同时四个数字两两相配,形成两组精致的对偶。

近30年来,谢有顺先生关于当代文学的见解和洞察,形成了具有启示性和辨析度的声音,受到作家敬重、读者喜爱。他善于把精深的道理说通说透,故能深入浅出,入耳入心。从《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到《文学的常道》《成为小说家》,再到这本《文学的深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批评的声音宽广、清晰、响亮。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化入常道、成为常识。用文学批评辨认和淬炼现代思想,是谢有顺文学批评的一种自觉、一种特色。《文学的深意》是作者近年文学思考的结晶,也是其文学观点的延续和拓展。

在作者看来,文学是灵魂的事业。过度专业化,失了与心灵的血肉关联,便失了求索生命意义的初心,便等而下之了。对存在和灵魂的强调,是作者文学思想特别动人的一面,也是其一以贯之的线索。在《文学的深意》中,面对当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倾向,他再次重申“人也许不认人,但灵魂认识灵魂”,只有接通与人性、生命之间的联系,这种“文学性”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而对文学灵魂和精神维度的提醒,永远不会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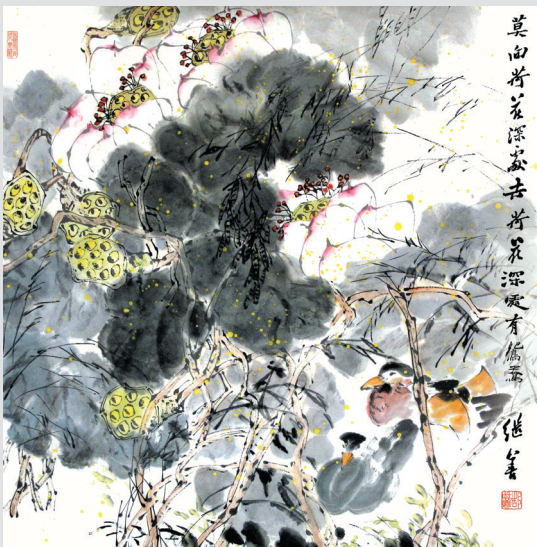
作者强调文体的内核是思想,作家的人格、趣味和思想是影响文体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在《文体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现》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文学的自觉其实就是文体的自觉”,继而又揭示了“文体是为思想赋形的,它甚至能照见作家思想的全貌”。古人说“文如其人”,这种说法在现代常被自足的文体观解构,让文体重新连接作家的思想和人格。作者文学批评的文体性也一向为人称道,体现的不仅是修辞自觉,更是思想自觉。

作者提出“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强调现代小说应有自我省思和理性精神,呼唤小说“从‘自我’这个茧里走出来,重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者的“现代”思辨,还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说融入其中。书中《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这篇访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为人”“人格”等论说:人生必先立其大,“而最大的莫过于人品”;“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无‘格’,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就越让人厌倦”;“要相信善的力量。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这些观点强调人格锤炼和道德勇气,作者相信现代文学的成果并非只在“文学”,“人格”才是写作之树上的珍贵果实。在碎片化的数字时代,重申人格、文德,发人深思。

《文学的深意》一书有完整的构架和内在的精神,是作者数十年文学观念体系的有力延续,也呈现了他崭新的批评成果和思想追问。让文学批评参与现代思想的辨析,参与当代心灵世界的创造,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构建,是本书带来的富有深意的启示。



画镜



郜继善 作